

摘要

乡村数字贫困表现为数字化时代因数字主体能力差异而导致的实质性自由丧失。在数字化时代，由于部分乡村居民经济条件的影响、学习能力等方面的不同，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社会所带来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使得个体在数字意识、获取、应用、创造上存在不足并无法享受数字红利，成为处于乡村数字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数字贫困是社会贫困在网络数字生活的进一步体现。随着绝对贫困治理迈向相对贫困治理阶段，作为发展性贫困的数字贫困阻碍了乡村的进一步发展，乡村数字贫困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为了全面而系统地了解乡村数字贫困，本文先从数字贫困的内涵以及形式入手，确定了乡村数字贫困的本质，以及数字贫困延伸到社会所表现出的经济性数字贫困、政治性数字贫困、文化性数字贫困，并根据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的理论，确定了乡村数字贫困从生存性贫困过渡到发展性贫困的新型贫困，集中表现为可行能力的丧失，再从权利的根本因素、能力的核心因素、制度的决定性要素三个综合维度确定了进行数字贫困治理的重点；其次对乡村数字贫困中城乡结构、社会结构、信息结构三个方面造成的数字接入权利、数字社会权益、个人信息权利失衡进行梳理；再次，对乡村数字贫困中数字意识、获取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缺失的原因以及可能会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进行了阐述；最后，本文对于乡村数字贫困的特点和如今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从信息技术、教育激励、法律监管三个角度对接下来如何通过构建制度体系对乡村居民数字赋权、提高乡村居民数字能力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伴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乡村数字贫困治理关注点也在不断演进当中，从数字接入的不平等到数字素养的不平等再到数字能力的不平等，对乡村数字贫困的认识以及治理在不断深入发展。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治理数字贫困要不断根据时代的发展而调整，以公平共享的价值为基础，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每一位人民享受到数字红利，这也是数字乡村的实践目标所在。

关键词：数字贫困；数字乡村；可行能力；发展性贫困；数字权利

ABSTRACT

Rural digital poverty is manifested as the loss of substantial freedom in the digital age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digital subject ability. In the digital ag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bility of some rural residents,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brought about by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society, individuals have deficiencies in digital awareness, acquisition, application and creation and cannot enjoy digital dividends, becoming disadvantaged digital poor groups. Digital poverty is the further embodiment of social poverty in the network digital life. As absolute poverty governance enters the stage of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digital poverty as a developmental poverty hinder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 poverty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rural digital poverty,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onnotation and form of digital poverty, determines the nature of digital poverty, and the extension of digital poverty to the poverty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society and digital politics, and determines the new poverty of rural digital poverty from survival poverty to development poverty according to Amartya Sen's feasible ability theory.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loss of feasible capacity, and then the focus of digital poverty governance is determined from three comprehensive dimension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of rights, the core factor of capacity and the decisive factor of system. Secondly, the imbalance of digital access rights, digital social rights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caused by urban-rural structure, social 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rural digital poverty is sorted out. Thirdly, the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digital consciousness, acquisition ability,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in rural digital poverty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soci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are expounded.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its own thought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digital poverty 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al incentives and legal supervision on how to build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to empower rural residents and improve their digital abilit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focus of rural digital poverty governance is also evolving. From the inequality of digital access,

to the inequality of digital literacy and then to the inequality of digital ability, the understanding and governance of rural digital poverty are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governance of digital poverty should be constantly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based on the value of fair sharing,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Make every people enjoy the digital dividend, which is also the practical goal of the digital village.

Key words:Digital poverty;Digital countryside; Feasible ability; Developmental poverty; Digital right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3
1.2.1 国内研究综述.....	3
1.2.2 国外研究综述.....	4
1.2.3 研究述评.....	5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6
1.3.1 研究思路.....	6
1.3.2 研究方法.....	7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8
1.4.1 创新之处.....	8
1.4.2 不足之处.....	8
第 2 章 数字贫困：数字化时代乡村贫困新形式.....	10
2.1 乡村数字贫困的内涵与形式.....	10
2.1.1 乡村数字贫困的概念与内涵.....	10
2.1.2 乡村数字贫困的表现形式.....	11
2.2 从生存到发展：乡村数字贫困的阶段特征.....	12
2.2.1 生存性贫困：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阶段.....	13
2.2.2 发展性贫困：乡村居民数字需求保障阶段.....	14
2.3 权利、能力与制度：乡村数字贫困的综合视角.....	16
2.3.1 权利维度：乡村数字贫困的根本因素.....	16
2.3.2 能力维度：乡村数字贫困的核心因素.....	16
2.3.3 制度维度：权利与能力的决定性要素.....	17
第 3 章 数字结构失衡：乡村数字贫困的权利维度.....	19
3.1 城乡结构：城乡差距限制数字接入权利.....	19
3.1.1 接入差异：空间结构的边缘化.....	19
3.1.2 资源投入：数字市场的偏好性.....	20
3.2 社会结构：群体差异影响数字社会权益.....	22

3.2.1 群体差别：社会结构不稳定性	22
3.2.2 阶层认同：数字社会地位降低	23
3.3 个体结构：数字差序损害个人信息权利	23
3.3.1 差序格局：个人信息泄露危机	23
3.3.2 政策支持：数字法律法规缺失	25
第 4 章 数字素养失调：乡村数字贫困的能力维度	27
4.1 价值层次：数字意识素养塑造不全	27
4.1.1 价值判断：安全忧虑与意识恐惧	27
4.1.2 价值选择：数字排斥与日常困境	28
4.2 获取层次：数字基础知识配备不足	28
4.2.1 路径依赖：传统观念与数字理念	29
4.2.2 现实阻碍：数字教育与知识掌握	29
4.3 应用层次：数字专业技能素质缺乏	31
4.3.1 生产活动：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	31
4.3.2 社会参与：数字生活与身份融入	32
4.4 创新层次：数字文化个性创造缺失	32
4.3.1 广度延伸：数字媒介与文化传播	33
4.3.2 深度挖掘：人才聚集与精英反哺	33
第 5 章 以制度保障权能：乡村数字贫困的治理策略	35
5.1 公益信息制度：平等的数字技术供给	35
5.1.1 缩短数字接入鸿沟	35
5.1.2 包容个体能力差别	36
5.2 教育激励制度：精准的数字信息获取	37
5.2.1 塑造数字意识素养	37
5.2.2 培养专业数字人才	37
5.3 法律监管制度：规范的数字权利应用	38
5.3.1 明确数字权利归属	38
5.3.2 严格网络信息监管	39
第 6 章 总结与展望	40
致谢	41
参考文献	42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45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自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以来，数字乡村战略开始持续推进，数字化信息化进入大数据为表征的新阶段，乡村农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当前，全国各地的数字乡村建设如火如荼，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对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开始逐渐显现。随着数字化社会来临，凭借数字化和网络化、以智能化为主的信息技术，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数字红利”，但是在数字接入中、在使用与分享中，还衍生出区域、产业、群体间的贫富分化严重，表现出一种有别于传统贫困状态的新型贫困，这就是所谓的数字贫困。

2020年，我国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也标志着中国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阶段，与绝对贫困与生产力不足有直接联系不同的是，相对贫困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相联系，数字贫困就是由于在数字化建设之中乡村由于自身基础性条件不足造成的数字不平等。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要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契机，加快弥补“三农”领域的突出短板，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最为基础的组成单位，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在新历史节点中相对贫困重要性不断上升的前提下，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构建化解乡村数字贫困的长效机制对于加快共同富裕的进程意义重大。2022年党的二十大更是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人口整体进入到现代化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①，也进一步说明现代化治理中乡村数字贫困治理、保障每一位村民的数字权利的刻不容缓。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1.2 研究意义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节点里,数字贫困是传统贫困在数字时代的延伸,治理数字贫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研究数字贫困生成及其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理论意义

首先丰富了乡村贫困治理的研究内容。乡村是一个以自然,社会和经济为特色,集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于一体的地域综合体,它与城镇相互促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主要空间。数字贫困是科学技术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新情况下,数字接入、运用、共享之间的贫困分化,聚焦于乡村贫困治理中村民作为主体,注重其数字运用能力的研究丰富了数字贫困治理的研究内容。

其次有利于深入思考数字贫困的权利、能力以及制度的逻辑。数字贫困的生成是由于城乡差距以及结构失衡所导致的权利的缺失,并主要体现在乡村居民个人信息权的丧失,使乡村居民的发展受限,研究数字贫困的权利逻辑将研究对象聚焦在数字贫困下每一位乡村数字用户的基本权利,有利于全面地分析数字时代隐私权、数据权、信息权的归属与保护。

最后有利于从可行能力的全新视角促进数字贫困的深入研究。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与规划,还需要理论的创新与指导。然而现存的乡村数字贫困的研究大多是以定量研究为主,从理论视角出发看待数字贫困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化、社会排斥、社会不平等现象尚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可行能力的视角缓解农村数字贫困,能够为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2) 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进一步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对数字贫困、数字不平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中得到启发,明确数字贫困是当今社会发展到数字化时代的新型贫困,是与生存性贫困相对的发展性贫困,对于乡村之中的个人发展以及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长远的意义,政府积极地治理数字贫困能够加快共同富裕进程,加深了对数字贫困的了解。

其次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在数字乡村之中的信息优势,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乡村数字贫困治理关系到数字乡村的实质性成效,通过数字技术层面、法律政策层面、意识素养层面的思考来帮助中国的数字乡村实践,使乡村居民获得数字权利与能力,从而缓解乡村的数字贫困,对于改善城乡居民的生活差距,改进乡村居民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数字贫困研究最早由数字鸿沟研究发展而来，是对数字不平等研究的扬弃，更加关注数字不平等现象，是对数字技术更加深刻的认知和判断，集中于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近年来，关于数字贫困的内涵、表现、影响、表现方法等不断加深。

1.2.1 国内研究综述

数字贫困由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产生，而且是后二者的研究过程之中衍生的新议题。数字接入差距和数字禀赋差异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但数字技术运用、数字资源汲取能力的相对差距更难缩小，由此引发的数字贫困问题成为近期学术界的关注热点。国内学术界对数字贫困的研究主要有：

1.关于数字贫困概念研究。随着时间的变迁，学者对于数字贫困的概念解读不断深入。并从三个层面分析了数字贫困的概念：（1）知识性贫困。胡鞍钢（2001）认为知识贫困不仅仅是教育水平的低下，数字贫困作为一种知识性贫困也是在数字社会中获取知识能力的贫困、吸收知识能力的贫困和交流知识能力的贫困。刘自强（2021）认为数字贫困与教育水平息息相关，相对贫困者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导致了数字经济素养较低，并减少了社会经济收益。（2）权利性贫困。彭继增（2019）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数字鸿沟到数字贫困的转变，原因在于数字权利的不足，数字化社会出现了“落伍者”或者“边缘化”地区，从而形成信息获取、信息供给和信息应用能力的差异，（3）能力性贫困。周向红（2016）认为数字能力的贫困来源与传统贫困的后果之间的关系即传统贫困导致的结果是数字能力贫困的原因，如因为教育缺乏导致无法进行数字技术的学习，进而产生数字信息获取和应用能力低下。闫慧（2014）认为中国农村居民数字化贫困的常见归因类型有：数字化能力不足、数字化努力不够、数字意识欠缺。社会环境和社会支持造成了生理能力、经济能力、心理能力和素养能力四种数字化能力的缺失。

2.乡村数字贫困的针对性群体研究。（1）老年群体。随着数字贫困概念的提出，老年人成为了易识别的乡村数字贫困人群，林宝（2020）指出老年人的数字设备、经济收入水平、身体素质等多方面的影响造成了数字贫困。刘育猛（2022）则通过政策、经济、需求、教育多个维度给出了治理老年人数字贫困的策略。（2）青少年群体。学者关注到了少年群体作为乡村的未来主力军，对乡村发展具有积极性作用，并以此研究了数字技术对青少年的影响。牛婧（2018）认为是数字心理、数字能力、社会共同造成了青少年的数字贫困，并提出了如何增强青少年的数字感知以及能力。王素芳等（2022）通过乡村地区青少年的互联网以及图书 g

馆的需求得出了目前青少年在网络偏好上的娱乐化倾向,并且还通过家长、教师、青少年三方视角分析社会环境对青少年选择、使用以及过度依赖网络的影响。

3.乡村数字贫困的危害性研究。学者主要研究了数字贫困对社会、政治权利、个人平等的危害:(1)社会分化。周向红(2016)认为马太效应在数字贫困群体中的体现将使得贫富分化加剧,数字鸿沟、数字贫困不仅影响到信息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也会加剧某地区乃至国家的贫富差距。(2)社会机会剥夺。袁勤俭(2007)认为数字贫困剥夺了弱势群体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信息弱势群体无法获得和使用数字信息服务,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诸如电子商务、电子政府、网络教育、实时沟通许多活动和公共服务在网络上运营,使得人们失去了争取权利和谋求利益的机会。(3)乡村不平等。张俊(2021)认为农村数字贫困使乡村生产决策偏差、致诱性滞后、乡村劳动力禀赋内卷和乡村治理低效;强化了城乡不平等,并主要表现为经济机会不平等、发展权利不平等以及收入不平等。

3、数字贫困的治理路径研究。有关于数字贫困的研究方法,国内的学者主要集中在访谈法、数据收集法、田野调查法、定性研究法等方法,并通过测量方法提出了数字贫困相应的解决措施。(1)数字资源公平化。龚新蜀(2023)通过面板数据指出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于消减数字贫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意义。吴玲(2018)提出农村数字化脱贫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数字化能力和保障他们的数字化权利,建立全面覆盖的数字教育体系,促进农村数字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的“数字红利”。(2)强化数字感知以及数字教育。闫慧(2016)提出当前的数字化贫困治理更应该关注并强化数字贫困群体内心的感知因素,使他们避免因受到多个层面消极因素的影响而逐渐深陷并被固定在数字化贫困状态。闫慧(2017)还通过中国农村居民的数字化脱贫模型总结出来不同类型的数字化贫困及脱贫策略,肯定了公共文化机构对数字化扶贫的指导作用。杨嵘均等(2021)则强调通过教育实现主体能力的加强,提升数字能力,在提升乡村居民个体素质的同时带来收益。(3)数字法律保障。宁日标(2020)提出可行能力造成了数字生活的低标准状态,想要通过明确宣示上网权利来保障数字能力。潘风焕(2022)则是阐述了如何从数字权利监管的层面激发数字金融的更高效益。

1.2.2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乡村数字贫困的研究更加集中于整体的数字贫困概念、表现维度、解决措施等方面,对于集中于乡村的数字贫困文献较少。

1.数字贫困的概念研究。国外对数字贫困的研究较早,从概念的提出到现在的研究已经有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主要体现在:(1)信息差距。关于数字接入

上不同阶层体现出的差异，英国《时代教育专刊》里指出数字化信息政策鸿沟给教育机关选择多媒体技术带来很大的困难。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政治学教授莫西鲁克(1997)最早提出了数字贫困的概念，指出了数字不平等的标志是“信息战争”，即在新时代，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变成了企业持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知晓者与不知晓者之间的对抗。有技术接入机会的人与没有技术接入机会的人之间、具有网络素养与不具备网络素养之间存在着信息差异，这些信息差造就了数字贫困。(2)接入不平等。曼纽·卡斯特尔(2001)将数字鸿沟定义为人们在接入和获取 ICT 方面的差异，在这之后伊斯特·哈吉坦教授(2002)指出数字贫困与数字鸿沟的区别在于后者更加强调数字媒体的接入和使用中存在的差异，而数字贫困是不同人群在接入和使用 ICT 的差异，所决定的一系列不平等的现象。(3)社会分层。而李奈特·克瓦斯妮教授(2002)认为数字贫困的出现也是一种社会分层现象的出现，由数字不平等产生的数字贫困能够很好地解释政治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如何在数字社会通过信息技术得到再现。

2.数字贫困的表现维度研究，目前有关研究关于数字贫困表现的有关维度大概可以分成三类。(1)常规维度。胡辛等学者(2004)认为数字贫困是数字技术使用上的贫困以及不平等。一般包括数字心理、数字接入、数字所有权。(2)资本视角维度。富克(2009)认为数字上的贫困由社会资本决定并影响资本，包括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等资本上的不平等。(3)指数以及系数的表现方法。吉尔教授等(2006)就把多层次的评估测量方法用于数字技术的应用情况测量，建立数字指数来测量数字贫困，例如基尼系数、互联网接入系数等。

3.数字贫困的应对措施研究。学者们对数字贫困的解决措施有着不一样的侧重：(1)政策干预。苏桑托(2016)主张通过政策干预，进行 ICT 的信息赋权。政府要采取措施保障数字贫困人群的数字接入。(2)教育普及。奇桑戈(2014)主张数字知识普及，通过建立乡村的图书馆等教育资源来赋予乡村居民知识，这也包括数字技术的普及。专业的人才对于数字贫困治理具有重要的地位。数字机构中必须配备一定的数字专业人才。(3)社会参与。曼杜纳(2016)主张社区参与，在乡村之中设立共同的数字实践平台，推动数字信息技术的共享。

1.2.3 研究述评

结合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数字贫困的内涵阐述以及对数字鸿沟的测量等的研究不断增多，对数字贫困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多集中于数字接入方面的研究，并对数字贫困的表现形式进行测量，以此发掘数字贫困在日常生活中的对人的影响，纵观国内外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现有研究视角不够多样化，缺乏理论视角。大多学者集中于选择因变

量和自变量之后收集数字接入方面的 ICT 数据进行定量研究，然后建立数量之间的关系，接着为数字贫困提供建议，定量研究为主对于数字贫困的定性研究较少。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在变量的选择上大多只在人口统计、教育、收入层面，以及其浅薄的标准来对待数字贫困后再最后试图上升理论层面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数字能力方面的研究不足。大多集中于数字技术的接入，过于重视物质层面。往往会忽视软的层面，比如教育、素养、信息内容、语言和社会资源等。仅仅只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非物质层面的数字贫困。对于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研究被忽视了。

因此本文基于现阶段数字贫困的权利结构性失衡以及因能力不足造成数字发展受限的问题提出制度上的建议，以期增加数字贫困的理论视角研究以及加大对能力贫困研究的重视。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1.3.1 研究思路

通过数字贫困的内涵以及表现形式等的理论阐述得出目前乡村数字贫困的发展性问题，从权利与能力的角度出发，厘清数字乡村之中的数字权利、可行能力、制度之间的关系。先分析权利角度中数字乡村中数字技术的结构性供给失衡，这包括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的日渐加大，造成乡村经济发展停滞，影响共同富裕的进程，个人信息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与此同时从能力的角度分析乡村居民的价值、获取、应用、创新四个阶段之中存在的不足，数字素养的塑造不全影响了数字生活中的价值判断与选择，数字基础知识不足、专业技能缺乏造成了更高级别的数字创造无法施展。基于此，需从信息技术、教育激励、法律监管三个层面对乡村数字贫困群体进行权能保障，以期为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建议。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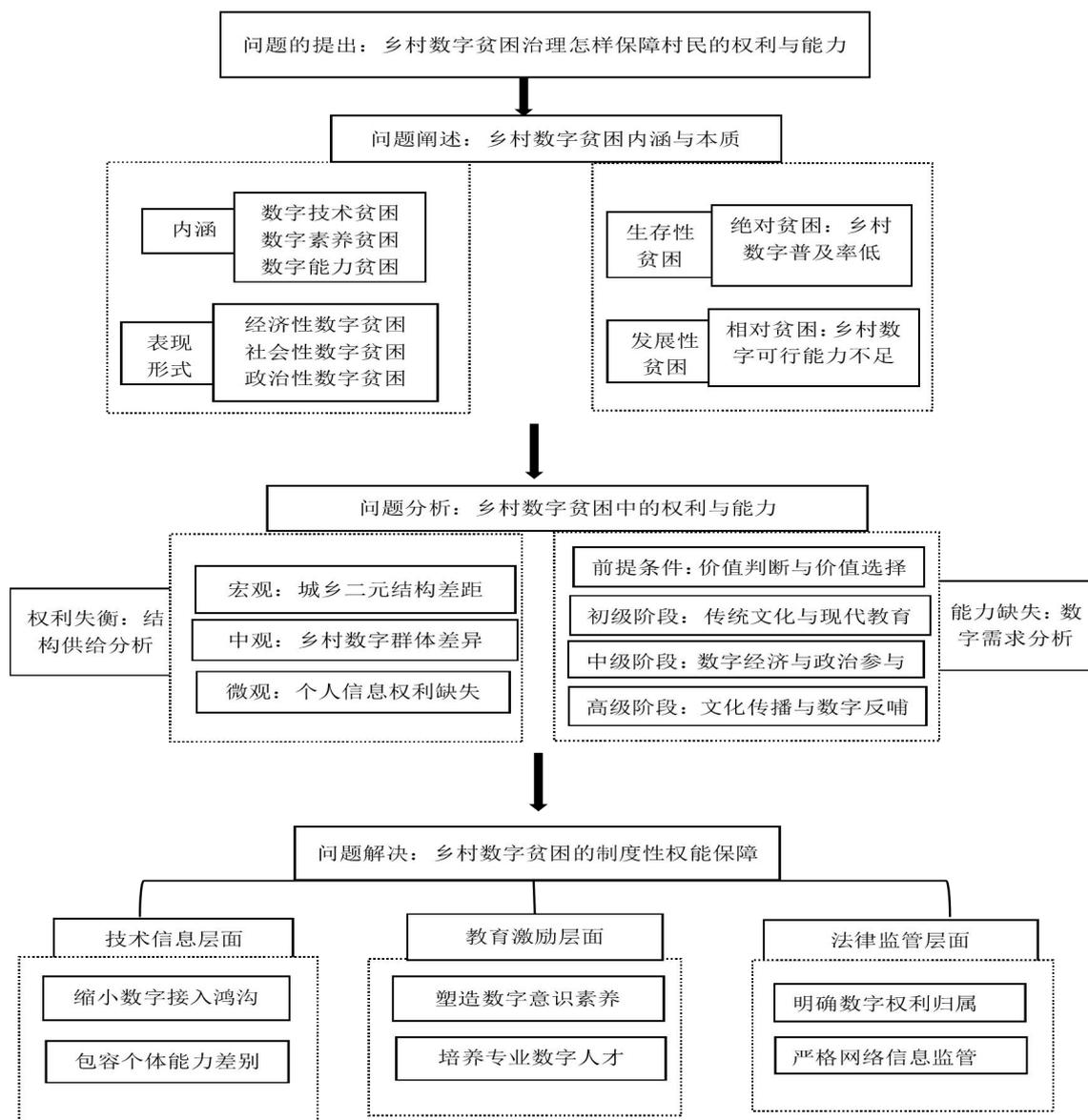


图 1.1 基于权利与可行能力的乡村数字贫困治理的研究思路

1.3.2 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方法。以“数字乡村”“数字贫困”“权利贫困”“相对贫困”“可行能力”为搜索关键词，通过图书馆、互联网、电子资源数据库等多种渠道获取大量文献资料，力图阐明可行能力的理论基础、数字贫困的生成根源，了解现阶段数字权利保护的相关政策以及法律，获取国内外有关于数字鸿沟、数

字不平等、数字贫困治理研究的最新进展，为数字贫困治理中权利、能力、制度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资料分析与支持。

(2) 历史分析方法。通过历史上对贫困的定义及概述进行梳理，形成对于贫困对于权利和能力的剥夺的历史演进过程的梳理文本，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数字贫困的特点，以此形成对数字贫困对乡村群体发展权的限制的归纳，结合当代的数字贫困特点阐述数字贫困对人的权利剥夺现象的原因以及影响，从中得到在实践中如何对数字贫困人群赋权、赋能的启发。

(3) 定性分析方法。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阿马蒂亚森关于可行能力等的论述，结合目前乡村数字建设的有关数据来探究目前数字乡村的实际建设状况，了解城乡之间的数字水平差异、乡村的数字覆盖率，以及没有数字建设乡村居民可能遇到的困难等的源头，为论文提供合理的理论视角，力求真实地探求乡村居民在数字实践中所遭受的不平等现象，根据数字贫困治理的理论基础得出相关措施。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1.4.1 创新之处

(1) 在研究视角方面。创新了数字贫困的研究视角，用可行能力的理论分析与硬件设施层面相对的软的层面，用权利、能力、制度的综合维度去研究数字贫困，能够深入剖析数字贫困的根本生成原因以及治理路径。

(2) 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不是探求影响数字贫困的指数以及用指标来分析数字贫困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因素，更多的是分析政治、社会、经济当中数字贫困对人的权利和能力的剥夺从中分析每一个数字乡村主体可能遇到的困境，再由小及大，分析数字贫困会给社会、国家带来的影响，丰富了乡村数字贫困治理的研究内容。

1.4.2 不足之处

目前为止，中国知网关于数字贫困的定量研究为主要集中点，而关于数字贫困的权利以及能力维度的相关论述寥寥无几。硕博论文也大多集中于数字乡村建设的进程及成果方面，这也为此论文增加了难点。另外，本文以定性研究为主，虽然参考了大量的文献以及数字贫困相关报告，对家乡的乡村数字使用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却未对全国各地乡村进行实地调研。本文的不足主要在于相关参考文献

较少以及本人实践经历的缺乏使论文缺乏沉淀。

第2章 数字贫困：数字化时代乡村贫困新形式

数字乡村目前已经取得了蓬勃发展，对于共同富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数字贫困影响着乡村的发展，也正因如此，充分证明了研究乡村数字贫困的必要性。而要充分地理解数字贫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从源头出发，探寻数字贫困的根本内涵。就其本质而言，数字贫困是从生存性贫困到发展性贫困的新型贫困，对于传统的生存性贫困，数字贫困具有全新的发展特征与趋势。具体来说，数字贫困就是乡村居民数字权利以及能力的剥夺，从根本来说是制度的不完善。通过对乡村数字贫困的理论渊源以及发展过程梳理，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乡村数字贫困的形成根源，另一方面也对我们更好地把握数字贫困的本质奠定基础。

2.1 乡村数字贫困的内涵与形式

数字贫困是社会群体无法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维持生活必需品供给，保障个人发展需求的新贫困形式。根据联合国对贫困是低收入无法维持生计；无法享受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缺乏社会交往与政治参与的能力；缺乏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最终无法融入到社会集体生活的定义，在数字贫困状态下，乡村部分低收入贫困群体在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中不断丧失各种社会权利以及机会，与其他群体如城市数字接入富有者的社会差距也不断在拉大，数字鸿沟问题不可忽视。

2.1.1 乡村数字贫困的概念与内涵

数字贫困作为一种新贫困形式，在直接相关的概念中，就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缺失状态，不管一个社会阶层是否处于经济贫困当中，只要作为服务产品的ICT不管是因为技术配备本身的缺陷还是数字群体自身的能力缺乏，未能被该群体作为数据资源被充分利用和消费以满足需求，那么该群体处于数字贫困之中。乡村数字贫困被认为是乡村居民被剥夺了维持数字生活所需的能力，激发这种能力需要由社会资产、数字能力和信息意识共同作用^①，以ICT缺失为表征的数字贫困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贫困、数字能力贫困以及数字意识贫困。

^① 闫慧.农民数字化贫困的结构成因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02):24-39.

1、数字技术贫困。数字技术主要指接入以及获取 ICT 上，数字技术贫困具体包括 ICT 接入上的，在计算机硬件、软件、宽带等方面的接入以及所有权状况上欠缺；技术使用上的，在数字技术接入上遇到瓶颈；技能运用上的，因为社会资本上的差距，在数字接入的网络可及性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接入方面处于劣势。

2、数字能力贫困。数字能力即乡村居民在熟练掌握数字技能、流畅使用智能设备的能力。数字能力贫困主要体现在：第一是在使用的自由度上，即不能够熟练掌握数字工具，缺乏必要的数字经验。第二是在利用率状况上，因缺乏技能将数字设施束之高阁。第三是在数字实践中无法达到预先设定的结果，即使有一定的数字运用基础，却无法使 ICT 的应用达到预设的最高。

3、数字素养贫困。数字素养指操作、控制、维护 ICT 并且在其中受益的素养，这种素养主要包括数字意识以及数字心理。数字素养贫困第一表现在对利用数字手段达到怎样的目的不明晰，第二表现在缺乏兴趣以及动机去了解并融入数字化社会，第三表现在对数字生活的排斥甚至抱有敌意的态度。

本文所指的乡村数字贫困是在数字技术虚拟缺陷、社会结构失衡、个人意识素养缺乏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乡村数字资源不能被充分利用。随着 5G 技术目前在全国各地的积极运用与推广，信息资源在数字化时代下变得更加偏向城市、年轻群体、公权力部门、信息技术巨头，导致出现了数字发展的两极分化现象，乡村的数字贫困更加严重，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密度低于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较高，而乡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对于信息产品的需求和购买力造成了城乡之间网络信息发展的差异化。数字贫困人群的主要表征就是没有物质条件、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使用电子设备并进入数字生活。

2.1.2 乡村数字贫困的表现形式

乡村之中被动裹挟进信息化时代浪潮中来的社会人群，包括接受程度低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ICT 等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社会群体，以及由于经济能力有限而无法接触互联网的人，数字技术兼有双重功能，在对机器和物的显性操作和控制背后，同时进行着对人的隐性控制和软镇压。^①乡村的数字贫困群体没有能力享受“数字红利”带来的“隐性权力”，从而处于弱势地位，甚至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数字化对于乡村群体来说是一种新型侵权。因此数字贫困是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条件下数字鸿沟出现后经济、社会、政治上的不平等现象，它不

^① 魏久尧.技术权能:现代国家的隐性暴力——现代政治哲学沉思之一[C]//.“西方政治哲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出版者不详],2011:216-227.

仅仅是信息通讯技术上的不平等，还包括社会网络当中地位以及权力的不平等。

1.经济性数字贫困。数字贫困不仅仅受收入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也会受到数字贫困发展的反作用。乡村居民在购买、更新 ICT 的支付能力，宽带等基础设施的成本受乡村的经济实力的影响，更进一步来说国家总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而数字的发展水平会反作用于经济，带动乡村的经济水平提升。

2.社会性数字贫困。数字贫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文化复制的结果，信息技术上带来的社会信息差让人们在数字获取上产生了数字社会阶层分化，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乏者之间存在着社会差异，例如社会群体在择业就业、家庭物资购买、教育资源选择上因 ICT 的获取能力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特殊群体之间，如乡村社群、老年人、残障人士的数字，带来社会认知贫困。在社会数字网络中，乡村由于群体的差异性带来的数字贫困可能会影响造成社会性的动荡。

3.政治性数字贫困。数字贫困是传统阶级斗争在数字信息时代的再现，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和权力是不平等的。个体在网络社群中参与政治事务的积极程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在现实中对于影响政府 ICT 普及、配置政策的能力。人们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参与到政治生活而积累的可供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影响社会成员是否为某一个政党或社会群体的一分子影响到其对政治权力的控制程度。大数据的时代，数据算法似乎比人更具力量，乡村数字贫困人群的隐私暴露在日渐复杂的数字时代中。

数字化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生存和交往方式，带给了人民更为自由的信息交流平台，但是数字的广泛应用造成的数字贫困的表现形式在经济、社会、政治上的影响都会使得乡村治理困于“数字利维坦”之中，使得乡村居民的隐私与数据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更进一步来说会对国家安全以及稳定性造成冲击。^①

2.2 从生存到发展：乡村数字贫困的阶段特征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中国解决了数亿人的生存问题，绝对贫困治理阶段落下帷幕，但是乡村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相对贫困治理问题在新发展阶段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在数字时代进程不断加快的现实环境中缓解数字贫困现象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① 唐皇凤.数字利维坦的内在风险与数据治理[J].探索与争鸣,2018(05):42-45.

2.2.1 生存性贫困：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阶段

绝对贫困论代表者本杰明·朗特里将贫困定义为“一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没有足以延续生命的必需品（如食物、衣着、住房和燃料）的最低费用，那么，他就跌入了绝对贫困的境地”^①的生存性贫困。1999年开始我国拥有家庭固定宽带，在2010年之前我国乡村的宽带用户占比仅为20%，乡村宽带普及率水平在全国范围之中处于极低的水平，也就意味着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城乡的数字基础设施配备一直处于分配不均的状态，而乡村的宽带不足让乡村居民无法拥有数字必需品也就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使用的权利被阻隔于乡村生活之外，数字意识以及数字能力更无从谈起。

乡村数字的生存性贫困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相关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劳动生产力的低下会使极端的绝对贫困持续性出现，最终造成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②因此数字时代中国居民的生存性贫困与生产力水平有着绝对联系。从消费层面来看，联合国换算出人均每日消费并以此设立了支出标准线，再通过一个人支出低于标准线来判定为贫困，因此判定一个人处于绝对贫困要看社会劳动者的收入不足以或者勉强维持其本人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乡村数字贫困产生最初就是由于数字化时代里村民的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和个人所需的基本数字消费，可以将每人每天的数字生活所需金钱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作为判断依据，在乡村贫困人口多，并且大多数乡村居民宽带未接入的情况下，数字支出所占乡村居民每日支出可忽略不计，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低水平造成了乡村数字贫困。

2010年工信部首次提出要将宽带积极引入乡村，2013年宽带中国战略开始正式实施，2013年底，中国还有8249万的乡村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群在生存之中数字技术在给人带来便捷生活的同时，也将人带入了新的生存危机。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但在精准扶贫工作开展过程之中，中国的扶贫道路依旧面临着艰巨的任务，绝对贫困依旧存在于全国各地乡村。到交往数字化的时代里，人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存在危机，数字技术加速了隐私的消失，人变成了无处藏身的人；人的存在为数所定义，人的异化程度愈发加剧；交往日益形式化，人的交往行为日益沦为一种交往无意识。^③由于生产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背离，乡村绝对贫困人口因失去生产的客观条件而难以致富，甚至连就业权利都得不到保证，这就决定了他们陷入数字贫困的必然性。

① 唐钧.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方法的探讨[J].社会学研究,1997(02):62-73.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8.

③ 李泓江.数字时代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困境与人的存在危机[J].北京社会科学,2022(05):85-95.

2.2.2 发展性贫困：乡村居民数字需求保障阶段

发展性贫困与生存性贫困紧密相连，是在生存性贫困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不作为影响人的决定性要素而出现的新型贫困。2020年中国通过精准扶贫实现了全面脱贫，“两不愁三保障”已经基本实现，温饱问题已经不再是衡量乡村贫困的绝对标准。与此同时，随着“宽带中国”政策的实施，以及乡村的宽带用户占比也从不断从20%上升到了30%，“互联网+”战略的实施使数字普及率逐年增高，截至2022年6月，乡村的网民普及率已经达到58.8%，数字作为一种普遍的技术手段不断融入到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后精准扶贫时代最值得关注的已经不是数字绝对的生存性贫困问题，而是相对的、发展性的贫困的问题。

不能只依据收入高低以及拥有的数字基础设施来评判一个人是否处于数字贫困，相对贫困论与能力贫困论的提出者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是相对的，并且应该根据人是否丧失可行能力来判定其是否处于发展性贫困状态，拥有可行能力才能拥有实质性自由。在森之前的亚里士多德关于生活质量以及亚当·斯密关于生活必需品的论述就能够充分体现这种自由。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好的生活需要一定的生活质量，生活必需品不仅仅是维持生命的必不可少的商品，还应该包括国家的风尚、使得人能够成为维持值得称赞的人的体面，甚至是最低阶层人民的体面所不可缺少的东西^①，也就是说要使乡村居民拥有美好的数字生活必须要有数字生活必需品，这不仅包括数字的基础设施，更包括了居民要维持数字社会的身份以及基本运转的必需品，这种数字生活必需品决定了数字人的生存以及发展。

而这种数字必需品必须满足包括人的权利以及可行能力等的各种需求。阿马蒂亚森基于前者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作为人能够产生价值的“功能性活动”，这些功能性活动包括吃穿住行的基本生存活动以及投票选举等的政治社会参与，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对人类权利的剥夺，也即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基本可行能力不仅包括免受饥饿、疾病的功能，更有满足营养需求、接受教育、参与社区社会活动等功能，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一些失败。^②数字贫困导致了一些基本可行能力功能的丧失，这些功能的丧失也表现出了数字贫困。数字贫困中的可行能力缺乏代表的是实质性自由的缺乏，不仅包括收入水平的低下，还包括各种政治权益，例如，处于失业状态的人通过数字手段得到社会救济，收入在标准线之下的人能够得到各种数字便利，儿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 杨敬年译.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822.

^②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贇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15.

童都能够得到受数字知识教育的资格。因此对于数字贫困的现象，收入以及基本的数字基础设施在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阶段已经不再简单地直观判断一个人是否处于数字贫困的状态。

数字贫困即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数字化社会出现的一种相对贫困，是一种发展性贫困，集中表现在缺乏数字运用能力导致的缺乏数字社会机会，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的生活的实质自由。社会机会指的是政治社会机遇、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这些条件类似于不识字对于一个人参与如今日益变化的规范化的生产经济活动，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普及率上升，实现了人对数字技术的低层次需要后，乡村居民在发展的社会需要、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求层面无法得到满足。首先在社会需求层面，伴随着数字化时代而来的还有新的交流平台，以及前所未有的交流方式，每一位村民都有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心理需求。然而村民在数字社会中的身份认同不足，通过数字手段与外界社会进行交流的能力也不足；其次在尊重需求层面，村民有被人尊重的需求，这个层面主要是通过数字化平台社会参与以及个人的能力得到社会的承认，然而村民的社会参与程度不足，自我尊重的能力也不足，乡村居民无法通过社会参与融入到数字化智能化的现实，使得内心出现自卑、不自信的心理；最后在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层面，数字发展中乡村居民需要根据自身的潜力发挥个人最大的能力，这不仅仅是适应数字化的发展进程，更重要的是把数字技术作为工具，然而很多居民对数字的适应及使用尚存在很多问题，更无法将数字运用上从而实现自我价值。乡村个体的教育背景、身体素质、工作性质等多方面原因，均会造成乡村陷入相对贫困困境。

数字技术发展迅速且势不可挡，涉及了人类活动领域的全方面，所有人的生活不可避免地都受到了影响，数字贫困者在现阶段已经不只是数字接入和应用上的不平等，而是包括更多的社会权益、政治参与、未来自我实现的差距与不足，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必须通过权利规范、能力赋予得到正面解决。对于乡村的发展来说，数字贫困群体之所以在数字化时代处于弱势地位，是因为其发展权得不到保障，居民有权从数字技术和信息中得到受益和发展，这包括参与数字经济、获得数字教育和培训以及使用数字服务改善其日常生活的权利与能力。保障数字贫困人群的发展权，有助于保障数字权利，实现人更高层次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权比起个体权益更加注重集体利益，因此如若不注重个体的数字平等，由于数字化建设与社会基础之间的张力，目前的信息差距不仅无法缩小，数字鸿沟反而会不断加大，数字乡村的实践也将陷入发展性困境^①。

^① 谢文帅，宋冬林等.中国数字乡村建设：内在机理、衔接机制与实践路径[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02):93-103.

2.3 权利、能力与制度：乡村数字贫困的综合视角

乡村数字贫困的本质是数字权利与可行能力双重差异下产生了数字弱势群体的现象，表现为数字权利的剥夺以及数字能力的丧失，对数字贫困的生成逻辑的分析要重点关注乡村数字贫困人群，多维度地分析空间分布、群体差异、政策不足的外部原因以及数字教育、数字意识的内部原因相互作用下造成的数字贫困，由表及里地探寻乡村数字贫困的深层次原因。

2.3.1 权利维度：乡村数字贫困的根本因素

为权利而斗争贯穿人类的历史的始终，权利代表着正当性，也包括自由、平等和各种社会利益。然而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一部分乡村人口由于自身能力、客观条件等原因的限制，被动地在数字乡村建设发展之中处于劣势地位，或由于数字化发展形式化，数字化努力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社会主体未曾通过数字化行为和实践活动实现自身在社会各领域内的提升和发展，即使有数字化实践，也无法产生任何实际影响，丧失或削弱了数字发展权利。数字贫困的产生就是在数字化背景之下，某些群体更易产生可行能力丧失问题无法获得权利的现象，是一种新的贫困形式。

权利的失衡导致了可行能力的缺失，这些权利既包括受教育的权利也包括社会政治权利。权利的缺失对于能力的缺失有直接影响作用。只有当数字贫困者拥有享有各种数字资源的社会权利才有可能去拥有摆脱数字贫困的能力。对于乡村居民来说，拥有任何一种平等的实质性自由以及与之配套适应的制度体系是完全正当的，拥有物质财富和资源的权利是应然的，乡村数字贫困的存在损害了一个社会应有的社会正义。^①在一个平等且实现乡村居民实质性自由的社会，人人都有资格享有社会资源，反之，社会资源的缺乏将影响乡村居民的社会权利的行使、共同体资格的获得。中国乡村的数字贫困大多是由于经济和教育条件的匮乏而导致的，而资源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乡村数字弱势群体资源权利的缺失。数字贫困的实质不仅仅是可行能力的缺失，更是由涉及了社会权利的贫困而决定。

2.3.2 能力维度：乡村数字贫困的核心因素

可行能力的缺失是数字贫困的核心。数字贫困的实质是缺乏数字能力，村民最为理想的现代化生活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字能力才能实现。从贫困的表象来看，物质资源的匮乏是大多数贫困者的实际生活状况。但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分析，贫

^① [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M].倪道钧,译.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56.

困者的贫困实质是缺乏获取物质资源的能力以及获取这种能力的权利。^①在之前的扶贫工作中，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似乎是各国扶贫的基本模式，但更为重要的还要彻底解决数字贫困者的能力问题。仅仅停留在政府层面用相关政策来推动数字技术普及是不可能完全消除数字贫困的，只有激发村民自身的力量，才能让数字发展长久不至于脱离政府的控制就返贫。

在乡村现代化发展中，村民可行能力的缺失造成了数字贫困，也是他们无法通过数字手段走出相对贫困、促进数字社会发展的更深层次原因。政府的规则保障使乡村居民数字机会平等是数字贫困者能够脱离数字贫困的基础，平等的机会相当于一个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中每一位中国人民都是处于一种数字“无知之幕”中，获取数字信息并培养数字能力的机会均等，那么他们能够通过数字技术进入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的机会也均等。只有给予每一位乡村居民平等的数字机会，获取自己的数字能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获得了自主权，他们才能真正摆脱数字贫困的枷锁。

2.3.3 制度维度：权利与能力的决定性要素

制度是数字贫困的治理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影响和保障村民可行能力和发展权利的决定性要素，权利与能力更多地是从村民的角度看待问题，而制度从更高的社会及国家的角度来看待数字贫困，能够统观乡村数字建设全局，将数字贫困治理系统化、规范化。用各种制度构建数字乡村建设中的能力脱贫机制以及权利机制触摸到了数字贫困治理的根本，能力脱贫和权利脱贫机制就是要提升贫困者的可行能力以及对社会资源的实际享有权，换句话说，也就是要通过制度使贫困者拥有基本的数字信息设施、足够的数字意识以及数字应用能力以享有各种社会机会与资源的权利，保证“基本的社会善”的实现。

制度脱贫机制从表面上看是从国家或社会的层面拟定的脱贫战略，但实则不然。“对我们来说，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②也就是说制度脱贫的最终目的是合理的权益分配，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每一位乡村居民的社会需求层面发展。因此，把数字技术置于价值塑造的制度约束之下是将数据以及信息合理应用到乡村之中、保障每一位乡村居民数字权利与能力的关键。^③必须要通过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赋予乡村数字贫困者所需要的数字权利以及可行能力，把握权利、能力以及制度的相互联系来最终实现数字化

① 虞崇胜,唐斌,余扬.能力、权利、制度:精准脱贫战略的三维实现机制[J].理论探讨,2016(02):5-9.

② [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7.

③ 陈明明.数字化治理:现代国家的技术、组织与价值[J].浙江社会科学,2023(01):59-66.

发展的现代化乡村。

第3章 数字结构失衡：乡村数字贫困的权利维度

对于人类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加剧的、自社会产生以来就有的强弱之分，有的能够被科技的更新换代而演进并自我化解，有的则必须提供公权力的主动介入，否则就会加剧社会不均衡^①。而数字贫困现象不能单被看作是科技进步的衍生物，更应该把它看作是社会结构变革当中不能回避的基本社会矛盾，个人在数字生活中的参与较之政府以及城市科技大企业的合作要薄弱得多，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权利危机的数字不平等，表现为数字接入权、数字话语权的不平等以及个人信息权上的缺乏。

3.1 城乡结构：城乡差距限制数字接入权利

从2022年中国第50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可以发现中国乡村互联网普及率随着中国整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在逐年递增，但是从中可以发现对比城市与乡村互联网占比，乡村占比不足30%。（如图3.1所示）与城镇人口相比，乡村居民ICT接入以及资源运用程度明显不足。

3.1.1 接入差异：空间结构的边缘化

乡村产生数字贫困的主要因素在于其在城乡结构中具有空间分布上的边缘性。一是由于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制结构，中国的乡村相对于城市而言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边缘性，这体现在乡村的经济发展要素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土地生产，乡村在数字作为新兴的发展要素的重视程度上不足以与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城市相比较；二是乡村在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条件方面与城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城市乡村居民在数字发展上的可支配投入较之多数城市远远不足，城乡二者之间乡村在数字基础设施上处于劣势地位；三是城市化现象的出现，大量人口向城市转移，大小城市中数字资源供给的水平以及有效使用数字技术的更高，因此数字精通人才以及数字能力富有者在城市之中的数字发展潜能能够最大化，他们更加愿意生活在城镇，这使得本就不充足的乡村数字能力者向城市流入。

^① 严思思. 数字弱势群体权利的法治化保障[D].广州大学,2022.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78131046014006034>